

游顺钊决心在法国开拓聋人手语的研究,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奥秘和起源(包括语言的起源)很好奇。当然,事实上并不主要是兴趣、爱好的问题,他对当时语言学界的研究情况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语言现象,是一种涉及许多方面和众多领域的复杂的社会、生理现象,然而历来的语言研究,过分偏重听觉方面,只顾舌头和耳朵,忽略了视觉方面,不顾眼睛和双手。他觉得这种偏颇给语言研究的深入造成了障碍。有个问题常引起他思考:聋人历来用手势表达和交际,然而为什么很少有人对他们的表达系统发生兴趣呢?不少人对聋人及他们的表达系统缺乏了解,甚至有误解。他所经历的一件趣事,似乎很能说明问题:1972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有一天提出希望去聋人学校访问,一位军宣队负责人问他:“你是研究语言的,为什么去找没有语言的人呢?”对他访问的动机似乎颇有怀疑。岂知他正是希望把无声的语言与有声的语言沟通起来,发掘手语材料以促进和更新语言理论的研究。正因为这样,他决定独辟蹊径,全力投入手语的研究。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多年的调研,他的看法渐趋成熟,遂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视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所谓“视觉语言学”,是指着眼于视觉方面,从时空角度对聋人手语以及其它一些表达系统进行语言学范围的研究。在1983年3月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游顺钊曾对提出视觉语言学的动机作过解释。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理论框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想把它当作一门新的学科,而只是希望对来自手语等不同系统的材料的视觉和空间因素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把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视为普通语言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希望,通过引入“视觉”这一大有发掘价值的方面,拓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加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联系,从而充实和完善普通语言学理论。

视觉语言学的研究并不限于手语范围,它包括一切可从视觉方面进行研究的领域。然而,游顺钊对视觉语言学的研究确实是从手语开始的,他提出的不少见解,也主要得益于他对手语的独特观察和分析。对聋人手语的研究,尽管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历来规模极小,并未得到大部分语言学家的承认。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才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但所考察的对象大致仅局限于美国等地的一些规约手语 (conventional sign

languages)。游顺钊认为，这些规范手语，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围口语或书面语的影响，实际上并非研究手语原始状况的理想论据材料。由此，他萌发了直接观察和记录“离群”聋人独创的自然手语的念头。所谓“离群”聋人，是指先天失聪，却生活在有听觉的人群的社会中，跟别的聋人又未曾有过接触的聋人。他们从未进过聋人学校，不识字，也不认识任何规范手语，因而他们所创造的手势语未受过任何外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真正未受“污染”的自然手语，是最理想的研究材料。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筹划和摸索之后，游顺钊从1977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离群”聋人自然手语的调查工作。1977—1986年间，他先后十一次到加拿大北部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以及我国北京、广州等地调查，每次一般两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达六个月。其间，还在美国、法国、日本、香港等地进行了有关的考察。在这十多年里，他曾对十二名“离群”聋人的手语做过深入调查，其中尤其是对加拿大魁北克省魏蒙塔希(Weymontachie)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比蒂贵(Pettikwi)女士和我国广东的郝家姐弟进行过长期的跟踪考察。在调查中，先后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手势，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自然手语资料。

在直接观察、分析自然手语的基础上，游顺钊发表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论文。第一篇重要论文是《基本手势序和词序共性所受的制约》(1977年完稿，正式刊出于1982年)。在此文中他提出，手语是一种时空形式，保留着时间域和空间域两种特性，时间域决定手语的基本手势序和口语基本词序的时序，空间域则与基本手势序和词序的空间配置有关。他引用大量的自然手语资料，论证了如下的一条规律：包含三个基本成分(施事、受事、动作性联系词)的陈述性手势串，有一个共同的成分排列次序，即施事和受事二者在时序上必定先于动作性的联系词而出现。比如，要表达“猫逮住老鼠”这一意思，“猫”和“老鼠”一定出现于“逮住”之前。聋人在打这一手势串时，先在一端表示“猫”，再在另一端表示“老鼠”，然后在这两端之间做抓的动作。按这三个手势出现的先后次序，亦即从动态观点来看，可得出这一手势串的时序NN'R(相等于一般所说的SOV)。然而，手势涉及时空两个方面，上述时序是就时间域而言的，若从空间域来说，即从静态角度看，按这三个手势出现的空间位置得出的次序则是NRN'(相等于一般所说的SVO)。因为“逮住”这一动作实际上是在N和N'这两点所占的空间位置之间表示的。游顺钊认为，口语中两种占优势的词序NRN'(SVO)和NN'R(SOV)，前


者是以手语中成分的空间位置的次序为模型的，后者则以手语中成分出现的时序为次序。然而，在他看来，由自然手语发现的时序，从认知层次上反映了各种信息表达系统更原始的共性。

随后，在《儿童语言的天然词序》(1979)、《中国古文字的结构程序》(1983)等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时序共性不限于自然手语，还统摄着口语、表意文字等表达系统的成分排列次序。他根据大量测试材料证明，以 SVO、SOV 和 VSO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为母语的儿童，在他们的口语尚未完全接受母语的基本词序之前，同样反映出上述的时序共性。他还提到，甚至猩猩娃索 (Washoe) 的手势序发展也表明，她开始一直是用的 NN'R (SOV) 时序，只是后来才被训练成跟英语一样，采用 NRN' (SVO) 的次序。此外，他又以甲骨文的象形字和小篆形声字的部首和笔顺的时空关系来说明这种时序的普遍性。后来他进一步从认知角度提出，各种信息表达系统的陈述性序列的成分排列，存在着一种由时序决定的普遍的“搭配范例”(coordination paradigms)，如：“处理对象”(老鼠)在时序上先于“处理动作”(逮住)，“泛指”(汽车)先于“专指”(雷诺牌)，“主题”(羊)先于“论述”(三只、肥)，“原因”(酒)先于“效果”(醉)，等等。

游顺钊在视觉语言学的探索中提出了一个颇引人注目的问题，即“感官认知制约”(cognito-perceptive constraints)。他认为手语、口语和表意文字这三种不同表达系统之所以表现出共同的排列顺序和“搭配范例”，是因为同受视觉感官认知制约的缘故。在近年来所写的论著(如《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中，他越加注重从认知层次分析时空角度所发掘的材料。在后来完成的国家博士论文中，“认知”问题更是贯穿始终。他指出，他之所以时常提及“认知角度”或“认知层次”，决非为了赶时髦。尽管目前尚不清楚认知特性在语言能力中的确切功能，但他确信，在视觉方面发现的共性现象，只有引入认知层次才有可能找到解释；而对“认知”理论的认识，又只有靠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才可能不断向前推进。游顺钊还提出，就语言现象来看，认知性质(cognitive)和概念性质(conceptual)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认知反映语言能力中原始的、基本的、生理的因素，具有稳定性，概念层次则涉及运用认知能力去理解和表达外部世界的问题，受制于环境的影响。由此他认为，认知层次和概念层次构成人类语言活动演

进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因素，认知层次可解释共性现象（如基本手势序和词序的共性），概念层次则可说明语言的个性、多样性（尤其是词汇的特性）。按他的看法，既应重视对多种语言、多种表达系统的共性现象的交叉比较研究，也要注意对一种语言、一种表达系统的个性现象的观察、分析。不过，从发表的论著来看，他的侧重点是在于从视觉角度探索跨系统的共性现象，并力图提出对这类共性现象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游顺钊研究工作的显著特点是，不迷信权威，力求创新。他不满足于只接受现成的理论和方法，然后补充一点新材料的研究方法。认为这样一味跟着时兴的理论转，终究是要吃亏的。在大学时代，他就好问“为什么”。开始研究语言后，脑海里的“为什么”就更多了。看了 Greenberg 有关词序共性问题的论文，就产生了“语言里为什么会出现共性现象”的问题。阅读一部看似很权威的巨著，作者对儿语自然词序的论断却引起了他的疑问。仔细探究后，才发现作者竟然在数据的运用上颠倒黑白。正因为常喜欢问个“为什么”，他才得以避开类似的一些权威论著的误导。同时，也正因为他追究“为什么”的执着，迫使他脚踏实地地搜集第一手材料，有理有据地分析、推导；从新的角度发掘新的课题，并尽可能提供一点新的解答，以求有所创新。由此，他独立提出了不少新课题，在手语方面，提出了研究“离群”聋人的基本手势序，自然手语手势的基本成分和发展阶段，手势形态学，手势人名学，手语词汇的派生方式等。以自然手语的研究为基点，又进一步提出了儿童语言的天然词序问题，甲骨文的空间配置时序，形声字的导向原则和语义类目问题，口语中时间概念的空间视觉表达问题，语言中的时间指向问题，不同语言参照点的差异问题，汉语量词对前列名词“底子”的重复功能及显示“类目”的功能，等等。对语言共性的探索，他也不满足于一些学者所得出的限于口语的、统计性的结论，而力求从多系统的交叉研究中寻找基本成分排列次序存在的理由。在这方面，他提出的通过论证口语、手语的词序共性，以探求离群聋人自创手语与语言起源的关系，是很引人注目的一个论题。在上述一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

游顺钊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视野开阔，不墨守成规。他特别强调从视觉角度审视语言现象，进行时、空两种形式和动态、静态的交叉分析。举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为例。他说，“大”这个字，人们往往只看到  这一象形的形状。然而，光从这一形状很难看出“大”的词义。其实这只是一个动作终点的静态，人们忽视了在这个静态之前还有一

个动态，因为这个字形实际上是用伸展双臂的手势来表示体积的宽大的。又如，甲骨文的𠂇（左）、𠂈（右）两字，为什么是这样写的？游顺钊不同意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左、右手的静态刻画的想法，而认为是先民造字时按动态的指示手势所作的忠实描写。这就是说，𠂇字表示左手手指尖端斜指向的一边是左，相反，𠂈字则表示右手手指尖端斜指向的一边是右。他指出，其实只要留意一下中国传统版画上的“左青龙、右白虎”的位置，就可明白了。类似这样的分析，在他的论著中不少。他觉得中国古文字研究因受传统的书法欣赏的影响，重视汉字的静态美，往往忽略了汉字构成上的动态因素。此外，在语义方面，游顺钊发现表达时间概念的词语大多来自表达空间视觉的词语，并提出从认知层次来看，无形的时间感知是依附于有形的具体空间 - 视觉事件来体现的。他还特别提到，东、西方语言表达上的一些差别，是由于参照点的不同而产生的。例如，英语和汉语的对话里，在使用 yes（是）和 no（不是）回答对方否定式的问句时，刚好是相反的。回答“Aren't you hungry?” / “你不饿了吧？”，英语肯定式回答是“Yes, I'm hungry”；否定的，则是“No, I'm not.”。东方语言，像汉语、日语，就与英语不一样，头段回答是以对方的话或问句为参照点的（即根据对方的陈述而定）。在汉语中，甲说：“你不饿了”或“你不饿了吧？”乙回答：“不，我饿。”或“对 / 是，我不饿。”（详见本书“余论”部分）他的这种强调动态分析，要求揭示一般死抱着静态分析法无法看到的隐藏在“静”后面的“动”的见解，已及对参照点差异的关注，确实很富有启发性，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充分证明了他提出的视觉语言学的解释力，以及他将时空概念和“动态”意识引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意义。正因为这样，他常常能提出一些人们不大注意或意想不到的方面，从而使我们对某些语言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或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这正是近年来他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原因。

游顺钊所掌握的“离群”聋人创造的手语材料，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材料，来之不易，是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欧、亚、美三洲所做的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的结果。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前辈语言学家注重“田野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比他们更进了一步。为了仔细观察手势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获取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他从与离群聋人交朋友开始，坚持背着沉重的电子仪器，尽可能靠近所调查

的“离群”聋人，甚至住到聋人家中。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要这些聋人乐于接受，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适应生活上的许多困境。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终于搜集到了迄今最完整的自然手语材料，仅比蒂贵和郝家这两种最有创造性的手语，他所收集到的手势就各有 1200 个左右。由于他跟聋朋友及其周围人的深入交往，他们最后把不少涉及私生活和家庭纠纷的禁忌手势都自愿告诉了他。由此可见，就是在研究工作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游顺钊也有他独特之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研究中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由于游顺钊的工作，视觉语言学在法国逐渐为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以往，不少语言学家强调手语不是语言，因而不予重视，现在从游顺钊的研究中发现，手语与口语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平行现象，手语（尤其是自然手语）的资料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当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来。又如，关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在法国汉学界和其他许多地方，大多仅限于语文学（philologie）的范围，主要为考证文献服务。游顺钊则不同，他着重从视觉角度挖掘中国古文字的静态书写系统中所隐藏的、可用来论证语言问题的原始痕迹，他的研究是属于语言学范畴的，这无疑拓宽了研究的领域。

历经十余年漫长的材料积累、缜密分析和理论构思，游顺钊的国家博士（法国的博士后最高学位）论文《手势创造与语言起源 —— 离群聋人自创手语调查研究》（CREATION GESTUELLE ET DEBUTS DU LANGAGE），于 1988 年初完成。对这一论文，指导导师、巴黎第七大学古里奥里（Antoine Culioli）教授，在答辩前的预审报告中的总的评价是：“论文的规模、方法论方面的智慧（intelligence méthodologique）、理论的跨度（portée théorique），都令人赞叹。作者凭着他的语言学修养、适应能力和异乎寻常的观察能力（exceptionnelle capacité d’observation），为我们提供了一大批无可比拟的（incomparable）、‘独一无二的’（unique）数据和资料。”他认为，“作者是一位高水平的理论家（théoricien de grande classe），他懂得提出手势活动的象征性问题，这涉及离散的（discret）和可类推的（analogique）语言单位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领域，对在空间起着关键作用的面部表情和结构的处理，以及受线性程序（linéarité）的制约，但也留有依赖语义的痕迹的结构成分的分析”。最后，他指出：“还须补充的一点是：游先生

的这一论文的可读性很强。字里行间，显现出这位研究员的一贯性格，热情和宽厚的心地。”。

论文答辩会于 1988 年 6 月 9 日进行，笔者有幸与会。答辩评审委员会由以巴黎索邦大学波蒂埃（Bernard Pottier）教授为主席的六名专家组成。评委们交口称赞论文的开拓性和完美程度。下面是几位评委的评说（大意）：

李嘉乐（A. Rygaloff，汉语语言学家）：打从头几行起，它已让读者看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记述、富于感情和引人入胜。他从事的是一项雄心勃勃的、然而也是充满风险的研究……这是一项异乎寻常地重要的（*exceptionnellement important*）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它的意义远远超越语言学的范围。

穆德兹（B. Mottez，社会学家，法国聋人问题专家）：为了寻找离群聋人自创手语的资料，游先生像寻找宝藏一样，十年间奔波于欧、亚、美三洲。论文的头一部分详述的田野工作，并非一般的工作札记，其间充满着惊险、失望、重重困难，自然，也有意外的喜悦，简直是一个长篇的奇遇故事（*roman d'aventure*）。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步步地完善系统的调查方法的过程中，时有新的发现。例如他采取先从离群聋人周围的使用人（有听觉的）入手，然后才调查手语的创造者本人的方法，就是一个特别精明的创见（*particulièrement astucieuse*）。

他收集到的资料数量令人惊叹，远远超过那两、三个同类研究（至今被视为经典之作）的微小的收获。

“词汇创造”那一章更见精彩，游氏的研究犹如揭示了一个丢失的环节。从此以后，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人们将再也不容忽略。

这个十年辛勤取得的巨大成果，可视为大家所期待的杰出国家博士论文的一个典范。

古里奥里（Antoine Culioli，理论语言学家）：游氏以他的热情和敏锐的观察力、文化修养（语言学的和别的方面的）、与被调查人的极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他的幽默感，对一个巨大的领域（主要在理论层次）发起了攻击。从此以后，他的这一论著，将成为所有涉及语言、象征活动、认知、共性，简言之，一切显示出描绘的结构和思维活动痕迹的研究的基础。

波蒂埃（Bernard Pottier，语义学家）：这篇论文具有少见的独创性和优质。论文作者在方法论上作了重大的和值得肯定的选择（grandes options méthodologiques affirmées）。他的这一研究是对符号学、语义学和一般语言学的一项显著的贡献。

答辩会快结束时，作为评审委员会主席的波蒂埃教授，颇为动情地说：“除了打一个满分外，为了有别于其他满分的论文，应该在满分上再加一个 A，意为‘非常优秀’。评审委员会认为，这篇论文不用修改就可以出版。”（大意如此）。

评委们一致称赞游先生论文的独创性，显而易见，主要是指他独辟蹊径，开拓离群聋人手语的调研，在理论上，最先提出视觉语言学的框架，在方法论上，论证了视觉角度在语言研究中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评委们同时非常赞赏游先生的论文如实显现的另一种少见的“优质”：那就是他的独特的、浓烈的人文情怀。他的热情、宽厚，对聋人的真诚的尊重和关怀，对他们手势创造的重视和珍惜，给评委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说起人文情怀，游先生在写作论文过程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他在跟论文指导导师古里奥里教授讨论写作计划时，导师不同意他写开头的“中加离群聋人独创手语调查历程概述”那一章。可是，他还是坚持按照原计划写了。他对导师说明，对他来说，这部分在感情上、思想上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没有这些离群聋人的无私帮助，无保留地提供他们一生的手势创造，这篇论文根本就不可能写的。他强调，他的这项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科学属性。为首的第一部分，其主要作用，就是显示论文的“人文”价值。没想到，古里奥里教授看了论文初稿后，欣然同意了！我们注意到，在预审报告的末尾，他还特地补充说明，游先生的这一论文，“可读性很强。字里行间，显现出这位研究员的一贯性格，热情和宽厚的心地。”可见，最终他是完全认可游先生的人文情怀的。同样，游先生的注重人文价值，也得到同行学者的普遍认同。在那次答辩时，就有很多人表示，很欣赏论文第一部分的详细描述，认为那对到穷困地区作田野调查，特别有技术上和道义上的参考价值。

游顺钊国家博士论文的答辩，学术界普遍给予好评，不少同行学者向他借阅打印稿，先睹为快，好些外地学者写信向他索取论文。视觉语言学逐渐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1991年，游顺钊的《视觉语言学》（中文繁体版）在台北出版，1992年，他先后在台湾

中研院史语所和香港大学中文系作题为“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的讲演，随后又在台湾清华大学语言研究所任客座教授，讲授视觉语言学一年。同时，游顺钊在《中国语文》1991/6、1992/5 发表了《原耻——历史态势学与古文字研究》和《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以外的一个探讨》的论文。1994 年，《视觉语言学论集》（中文简体版）在北京出版。由此，游顺钊从视觉角度对古汉字和汉语的考察引起了海峡两岸很多学者的关注。

国内已有好几位学者就游顺钊的观点发表评论或提出商榷，以下是两则与游顺钊的视觉语言学理论相关的评述：

1997 年，李学勤教授发表《古汉字书写纵向与丁公陶文》，与游顺钊进行笔谈。他认为，“《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这篇论文，在中国古文字学很少有人注意的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颖中肯的见解”。游顺钊在上述论文中说：“竹筒（或木筒）的面积分布是较宜于书写瘦长的纵向动物字汇形体的，结果是横放的动物字汇遭到淘汰，竖写的原则一直维持迄今。”李先生认为，这一假说顺利地解答了“纵变”起因的疑问。他进一步指出，1991 年，1992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山东邹平丁公发掘出的一个陶片，上有五行十一个文字，不仅文字纵向直下，有纵变，还含有一字像竹木筒编连的“册”字。由此可知，丁公陶文已经具备“直下”、“纵变”这样趋于成熟的现象，并且丁公陶文时代就可能有竹木筒了。因此可以认定，丁公陶文是古汉字书写“纵变”已知的最早例子，“‘册’与‘直下’、‘纵变’一起出现，恰好支持了游顺钊先生的假说，这绝不是偶然的。”^①

另一则评述是讨论古汉字“耻（恥）”的。表示“羞辱”这个意思的“耻”，在古文字里，为什么由“耳”与“心”这两个成分表达。游顺钊在《六个古汉字背后的传统手势》^②一文中说，许慎在《说文》中把“耻”释为“辱也，从心，耳声”，表明他不重视甚至没有注意到“耳”与“耻”在字源上的密切关系。他指出，若从生理和态势角度去观察，就可推断出古文字里的“耻”是按我国古代民风中的一个

^① 关于古汉字书写纵向的笔谈，见《亚文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第二辑）：李学勤《古汉字书写纵向与丁公陶文》；游顺钊《关于汉字纵变等问题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② 见游顺钊《视觉语言学论集》，徐志民等译，语文出版社，1994 年。

手势构思的。他举例说，我国南北方都可看到人们一边用食指在脸颊上向前轻擦两下，一边说笑对方不怕羞的话。此外，在广东，至今还能见到，有人一边在耳垂后边往前拨两三下，一边说着“丑（即羞）、丑、丑，甩（掉）耳仔（耳朵）送烧酒（作下酒物）”。这些手势，显然是对“脸红耳热”这类自然生理现象反应害羞的描画。游顺钊还补充说明，古代，大概在刖刑流行的年代，“指耳朵”这个手势应是个告诫别人不要做羞耻的行为的一个讯号，而不是个戏弄对方的等闲比划。它表示的是“小心你的耳朵”，而不是“看，你的耳朵都红了”。何九盈教授在《汉字文化学》一书中认为，游顺钊对“耳”与“聃”在义理上的关系所作的研究比较深入。在引述了游氏的上述意见后，他指出，“游顺钊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通过汉字获得具有特殊意义的规约手势及体态的信息’。他的分析过分强调了这一点，但对我们很有启发。……在游顺钊以前，似乎无人指出‘耻’中之耳为亦声，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有助于认识‘耻’的文化内涵。‘聃’后来演变为‘耻’，古人没有用‘止’取代‘耳’，而是取代了‘心’，足见‘耳’在‘耻’的构成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①游顺钊之所以能发现“聃”中之耳为亦声，正是以手势为切入点研究字源的结果。

最近又听说，美籍华裔语言学家戴浩一教授在台湾开讲“视觉语言学”，波蒂埃教授则在巴黎作“视觉语义学”的讲演。我相信，“视觉”概念、视觉分析对语言学理论与语言研究方法的拓宽与更新的重要意义，定会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的重视。

我跟游顺钊先生相识而有来往，始于1981年春。其时我应聘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课余常去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东亚语言研究所参加语言学研讨活动。在那儿经常遇到游先生，也听过他作的有关视觉语言学的报告。当时我就感到他的研究很有特色，所提出的论题和材料颇具吸引力。回国后，先后在《中国语文》、《国外语言学》、《语文研究》等杂志上读到他的论文，知道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进展很快。后来，1988年，我去巴黎东亚语言研究所进修语言学，1997年，我又作为访问学者在东亚语言研究所逗留数月，跟游先生经常见面，这就使我有机会对他的研究工作作更加全面而

^①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第237—23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

深入的了解。我阅读了他已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及部分尚未发表的手稿，并跟他作过多次长谈。我看到，他在这块处女地上的辛勤耕耘，已获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他那种执著追求、勇于实践、刻意创新的精神，令我非常钦佩。在聋人手语、儿童语言及中国的古文字等方面，他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并且特别注意把上述几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从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发掘问题，因而所写论文颇有新意。我觉得，把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介绍给我国学术界，是十分有意义的。为此，我先写了《游顺钊与视觉语言学》一文（刊于《国外语言学》1989年第2期），随后又把他的主要论文翻译、汇编，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视觉语言学》，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年；《视觉语言学论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年），算是了了我的一点心愿。

1988年游先生的国家博士论文通过后，我们俩就曾议论过如何把他的这一重要成果完整地介绍到国内的问题。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由游先生亲自执笔翻译，我们的夙愿才终于得以实现，令我深感欣慰。我有机会再次与游先生合作，更是觉得非常高兴。我相信，这一荟萃了他在视觉语言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大量珍贵资料的著作在国内的面世，定会引起语言学者、文字学者、手语研究者等的广泛的兴趣。

